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三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八期 ——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5b）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程贤策、党晴梵、陈葆昆	王友琴
【当事者说】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兼答季羨林	聂元梓
【各抒己见】	文化大革命论	解 龙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文革受难者

• 王友琴 •

◇ 程贤策

程贤策，男，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1948年入北大历史系学习。1966年被作为“黑帮份子”遭到“斗争”、侮辱以及毒打。1966年9月2日，程贤策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树林中服毒自杀。时年38岁。

我在文革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从来没有听到人提起程贤策的名字和他在文革中自杀的事情。虽然这个大学刚刚发生过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历史还未得到记录和分析，但是，有着著名文科科系的北京大学，却不教学生去认识和分析这些发生在自己学校的重要历史事实，这显然不恰当也相当具有讽刺性。不过，这也是普遍的现象。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最高权力当局的严格禁止。

后来我开始调查各所学校的文革历史，特别是在1966年被迫害而死的教育工作者们，包括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人以及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我跟很多文革的经历者们谈话，请求他们回忆文革时代的人和事。这时候我才听说了程贤策的名字。北京大学数位老师

的回忆和叙述，提供了一个一个的片断，使我能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渐渐拼装出程贤策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遭遇，并且整理出他被推向死亡的过程的线索。

1966年1月，作为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领导中文系的师生开会并发表讲话，内容是关于批判当时已经被报纸点名批判的《海瑞罢官》一剧。显然，他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一样，都没有反对过文革。而且，他们都尽量积极地投入了文革最初阶段的活动。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陆平、彭佩云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就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在广播大字报的同晚，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那里的原来的领导。工作组宣布北京大学是“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北京大学原来的整套领导干部都变成了“黑帮份子”。程贤策作为中文系中共总支的负责人，也被宣布停职。

1966年6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作组曾经在办公楼礼堂开“批斗会”，程贤策是重点被“批斗”的对象。工作组员和学生代表在台上讲话，程贤策站在台下听“批判”并回答他们的质问。工作组依据百分比，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所谓“牛鬼蛇神”。虽然所有的干部和教员都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除了语言上的攻击，校园里出现人身攻击：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人，打人，揪头发，等等。有人自杀。

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

程贤策在慌张中逃入一个女厕所。当时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说，她见到一个男人冲进来，先受了一惊，她认识程贤策，比他年长。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她装作拉裤子，想要阻止男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根本不听，把程贤策从女厕所里抓了出来。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还把厕所里的大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向景洁是中文系副主任，是中文系行政方面的第二负责人，他头上身上被倒了红的黑的几瓶墨水，面目全非，晚上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他背上被打得满是青紫，给他敷了药膏。

原来已经零散发生的暴力行为，在6月18日那一天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暴力行动。那一天，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他们的妻子是姐妹）遭到暴力攻击。胡寿文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中共总支副书记，他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虽然工作组一直在大力鼓励学生和“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所谓“斗争”，并计划很快严厉惩罚“牛鬼蛇神”，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北京大学工作组写了“第九号简报”，反对“618事件”。1966年6月20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各地参照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刘少奇不是不要学生“斗”人，而是不要他们“乱斗”。

刘少奇的做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1966年7月25日和26日，接连两天，“中央文

革小组”到北京大学召开全校群众大会，毛泽东的妻子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会上讲话，内容之一，是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待“6 1 8事件”的做法，他们赞扬“6 1 8事件”是“革命事件”，责备北京大学工作组是一个“障碍物”。他们宣布北大工作组是一个坏工作组。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五天后，毛泽东在给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支持信中点名表扬彭小蒙。

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有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时年45岁。

程贤策进了“劳改队”，和中文系其他几个“牛鬼蛇神”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厕所。他们做得非常认真，把厕所打扫得极其干净。有一天正在厕所里劳动，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浓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凹沟。接着又叫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他的头发被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被剪了头发之后，回到家里。当时他和一家人，与他的连襟一家人，合住一个两卧室的单元。每家的大人孩子都住在一间卧室里。虽然他们都是系一级的负责干部，但是生活条件相当寒酸，住房如此拥挤，他的连襟连自行车都没有一辆。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是和当时整个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这不但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也因为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在当时不但不事生产，还专门从事“阶级斗争”，阻碍和迫害那些从事生产和建设性工作的人们。他请他的连襟胡寿文帮他把头发修理一下。那天胡寿文也被强剪了头发。胡寿文说：修他干什么？谁难看？是他们剪的。他比较坦然，不在乎。他替程贤策尽可能把已经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修好一点。他很为程贤策担忧，因为看到他每天“劳改”回来，都疲惫至极的样子，脱了鞋子就靠在床上，无力挪动，一言不发。

后来，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据当时的记录，最多的一天有13万人次到北大校园“参观取经”。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交代罪行”，或者“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程贤策还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程贤策是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校园暴力再度升级，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100万红卫兵之后。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代表”。毛泽东还给北大

校刊写了题词“新北大”。这无疑是对北大校园里已经发生一切的极大支持。8月18日接见之后，红卫兵暴力全面升级。北京每天先有几十人后有几百人被打死。

8月2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和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的一些学生来到程贤策和胡寿文两家人合住的单元抄家。他们两家除了一些书，没有什么财产。他们的书被贴了封条。学生用铜头皮带毒打他们。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臂带袖章，身穿军装，腰系军用皮带。这皮带也用来抽打人。在8月初，红卫兵打人有时还显零星形式，到了下旬，红卫兵打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方式，他们可以正式摆开架式，用皮带一口气把人抽上几十下。军用皮带厚重并且带有粗大的铜扣，对人的肉体伤害性很大。在打他们的时候，还有人大声咒骂说：“老子今天是没有枪，要是有枪就打死你们。”等学生走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后来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当时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还没有很多人知道），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领导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在那一天，离程贤策家不远的另一处北大宿舍里，英文教授俞大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于当天晚上在家中自杀。

在8月24日之后，还有学生，包括附近中学的学生，来到程贤策和其妻妹家中乱翻东西，打他们。在北大校园里，暴力攻击也加剧了。有一次，程贤策被红卫兵用草席卷起来用棒子乱打。他看不见打他的人。棒子无情地落在他浑身上下。

8月30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建立正式的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革常务委员会”，聂元梓当了主任，她讲话“确定今后战斗任务”是要“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摧毁旧的教育制度”。那天晚上，程贤策和他的连襟一起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大会。他们在家里的平台上一同听了高音喇叭里聂元梓的讲话。程贤策始终表情沉重一言不发。事后他的连襟才意识到，那时候程贤策已经彻底明白也彻底绝望了。从7月27日到8月30日，在“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大学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权力体制，暴力迫害正在越来越系统化和制度化。各种迹象都清楚地显出已经发生的一切暴行并不只是年轻学生一时的乱打乱闹，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戮与迫害。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第二天，9月1日，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天有三百人被打死。

9月2日，程贤策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来到北京大学西北方向十公里外的香山的树林中自杀。

至于程贤策到底遭受过多少折磨和殴打，无法知道。这里我能记录下来的，只是他的几位同事亲友所看到的。我的判断是，他们仅仅知道程贤策所遭受的折磨和殴打的一部分。在我以前写出别的文革受难者的故事的时候，有人问过我所写的是不是夸大了的。我自己的看法非常明确，我的报告实际上只可能遗漏了大量的受难者遭受的酷刑和侮辱。因为死者已经死去，永远不可能说出他们身受的苦楚，作恶者现在总是掩盖和缩小他们对受难者所作的恶行，而旁观者只看到零星片断，缺乏同情心的旁观者还往往对他们的受苦视而不见，早已忘却。

9月2日早晨，程贤策没有在“劳改队”里按时出现。和他同在“劳改队”中的向景洁等

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竟然敢在这种情况下迟到缺席感到疑惑。后来他们被叫去开一个“斗争会”，听到宣布程贤策“自绝于人民”“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的话）”，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程贤策虽然死了，红卫兵还用白纸写了他的名字，把纸标插在“斗争会”会场上，两边还站着“陪斗”的人。开会“斗争”已经死去的人，在北京大学里程贤策不是唯一的例子。

程贤策之死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升级”成为该系“第一号黑帮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残酷“斗争”。一天傍晚，有一群学生到他的家里，把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布口袋套在他的头上，不顾他家人的哀求，把他拖出了家门。他们把向景洁绑架到一个房子里后，才把套他头上的罩子取下。

接下来的场景完全是按照电影里的某种审讯方式布置的。他们用强灯光照向景洁的脸，问他问题，而他们自己却在阴暗处听他的回答。窗户都是蒙死的，他不知道是在哪里。他们审问了他整整一夜。审问的“罪行”，不是别的，是文革前中文系中止了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的学籍，这被说成是“迫害林豆豆”，以及“迫害林副统帅”。实际情况是，林豆豆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不愿意再学工科，教育部给北大发文，要北大中文系收下她。林豆豆从清华大学来到了北大中文系。中文系派了专人照顾她，还派了两个教员帮她补课。没有人迫害过林豆豆，也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念头。林豆豆后来长期请病假，已经超过了学籍管理条例关于需要因病退学的时间，还是没有请她退学。后来她实在不会再来，中文系才中止了她的学籍。文革带来的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恶性膨胀，使得林豆豆退学的事情居然成为中文系的“罪行”，而且竟然用这样凶恶的方式来折磨中文系的负责人。

1968年1月25日，北京大学校文革委员会专门开了一个大会，以“迫害林副主席女儿”的罪名“批斗”了一批人。假如程贤策还活着，作为中文系的负责人，他一定会被拉到这样的“批斗会”上遭到“斗争”。

1968年，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那年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那一天，北大校园里充满了狂热的残忍与恶毒。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这样作，是为了两年前的这一天发生了“618事件”。一个残酷而丑陋的日子，又用这样的残酷而丑陋的纪念和庆祝，是为了再次肯定暴力折磨和虐待的“革命”意义。如果程贤策还活着，他那天也一定会遭到这场暴打。从程贤策第一次被毒打的1966年6月18日开始，两年里面，暴力迫害从未停止，还不断发展出新的形式来，也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我从与多位北大老人的访谈笔记中，整理出了以上程贤策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程贤策走向死亡的一步一步的轨迹。从1966年6月1日开始，到他在9月2日自杀身亡，他所经历的迫害都和文革的步骤密切而直接地相关联。6月1日广播北大大字报以后，他被停职被揭发批判；6月18日事件中他被打被侮辱；毛泽东对“工作组”和刘少奇的攻击，使他进了“劳改队”，被剪了头发，挂了牌子；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使他被抄家和遭到进一步毒打。他是在经历了整整三个月的文革以后，才决定自杀的。在这三个月里，文革的暴力迫害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在他自杀的时候，暴力虐待没有停止的迹象，暴力的权力机构却一步步稳固起来，作为文革对象的他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他死后的事情则说明，如果他不自杀，他也一定会遭到更多更漫长的迫害。

他的死，是非常阴暗，非常悲惨的。他的死不是孤立的个别的案例。在北京大学里，发生了一系列这样可怕的故事，有一批人遭到这样的命运。程贤策的死是北大人的集体的文革命运的一部分。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大学本来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科学和文明的代表。但是在文革中，北京大学却变成最野蛮残酷的行为发生的地方。暴力性的“斗争会”，包括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等等，校园“劳改队”，校园监狱，都在北京大学校园领先开始，更不要说道德方面的堕落如诬陷、谎言、谄佞等等普遍发生。北京大学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是“文革”真正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的最成功的例子。这种“成功”令人震惊也令人思考。

当我在北大作访问调查的时候，未有机会和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教授谈话。2001年我才读到了她的《绝色霜枫》书中关于程贤策的一章。应该指出，乐老师关于程贤策的文革经历的记述有误。乐老师错记程贤策在1966年6月遭到暴力攻击后立即就自杀了，其实他死于9月。这个记忆错误背后实际上也有很令人悲哀的背景：他们年轻时曾经是接近的朋友，但是在乐黛云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程贤策则仍在领导干部位置上，他们就不再来往，所以乐黛云对程贤策后来的遭遇了解不多。

很重要的是，乐老师的书讲述了1948年她和程贤策的相识，以及他们在1950年代的交往。这使我了解程贤策在文革之外的故事，以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怎样的思想经历。（见乐黛云：“‘啊！延安……’——忆程贤策”，载本刊zk0107b——编者）

据乐黛云老师的书所写，在1948年她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程贤策最先向她介绍了共产党歌曲和革命思想。1951年，部分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省，和很少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程贤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乐黛云当时19岁，掌管一个村子。按照上面规定的土地数目，在这个村子里划出了八个“地主”。后来这八个人全部被枪决，并且“陈尸三日”。八人中有一名老人，一辈子在上海做裁缝，攒钱在家乡买了地，成了“地主”，被枪决了。乐黛云当时不能习惯这样的残忍。作为土改工作团领导人的程贤策“开导”她说，“不能凭道德标准，特别是旧道德标准来对人对事。”“由于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任何第一反应都经过严格的自省，因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尤其是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也许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之一，但现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对立面，这正是我们和党一条心的最大障碍，因此，摆在我们眼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程贤策要她把这样的“惩罚”视为“必然”，从理论到实践都接受这种对被指为“阶级敌人”的人的残酷做法。

不知道这个程贤策当副团长的“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管多少个这样的村子，杀死了多少个地主。这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审判程序的杀戮。这样的杀戮，破坏了法律制度，破坏了农村经济，也破坏了人们的道德和良心。参与者以革命的名义作了这些，在摧毁所谓“敌人”的同时也在把自己改变成另一种人，即不要人性和道德的人。

乐老师的书里没有写这样的“土改”之后程贤策具体作了什么。我仔细阅读了北京大学在1998年编印的《北京大学纪事》，从中找到程贤策在北大的踪迹：他在1950年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团主席，1951年建立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时候，他当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当过统战部副部长。1959年，他被任命为专职的中共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年初，他领导了一段时间的文化革命直到他自己被“打倒”。

在“土改”之后，北京大学校园里进行的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然后是长达数月的“忠诚老实运动”。然后是“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北京大学搬到了被取消的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随后是更冷酷无情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北京大学有716名学生和教职员被划

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当初跟随程贤策搞土改斗地主的乐黛云老师被划成了“右派份子”并“下放劳动”。在1949年被乐黛云说服未随父亲去美国留学的好友朱家玉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投海自杀。中文系的一批老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其中有女学生林昭（请读“林昭”网页）。林昭离开北大后又被判刑，在文革中被枪决。

一批一批的人成为“敌人”，一旦被指控，就被无情地清洗出去，既不能自我辩护，也逃脱不了残酷的处罚。革命的巨爪不但在农村，也在这所中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学里面，把人一把一把抓起来，糟蹋丢弃。在一系列改造原来的北京大学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过程中，我们无从知道程贤策作为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的内心感受，但是他显然一直处在领导力量而非攻击对象之中。乐黛云的书写到了程贤策的人格魅力，他的笑容和热情待人的兄长风度，程贤策的同事们也说到他的精明、活跃与文雅的风度。但是，对实行“阶级斗争”的信奉和对人性和人道精神的摒弃，对一个人的行为显然能起更重要的作用。

文革开始。这一次他被指定为革命的对象了。他被“揪”出来被侮辱被打骂被“劳改”，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在文革中，象15年前在江西的那些地主和1957年的北大的那些“右派份子”一样，在一片喊打之声中，毫无办法自卫。1966年的所谓“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就象1950年的地主，就象1957年的“右派份子”，只要革命的领导人圈定你是“敌人”，你就失去了法律保护 and 得到社会正义的可能，死路一条。程贤策对这套做法可能理解非常深，在采访中，认识他的人都没有提到他曾经抱怨过他所受的虐待。只有对这一套不够了解的人才会惊讶和抱怨吧。他则了解“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搞”的。程贤策忍耐了三个月。他自杀了，没有再抱幻想。

在1966年，程贤策从“革命者”变成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看起来，文革好像是非逻辑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有其内在的逻辑。检视往事，现在可以看出，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铺就了迫害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参与的迫害，不只是对一些个人的否定，而且是对法治、对程序正义、对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公民权利的根本否定。当一套可以超越法律置千万人于死地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当一批批可以充当打手的年轻人被准备好了，那么参与建立这套机构与准备这些打手的人自己也会被吞吃掉。程贤策的死亡是恐怖的，是悲剧性的，他的人生道路也如此。

◇ 党晴梵

党晴梵，男，1885年生，陕西省合阳县人，文革前任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家住西安。从1966年8月30日开始，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到他家抄家，并且殴打他。9月4日，党晴梵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时年81岁。

党晴梵考过秀才，后来放弃科举，到上海进入由归国留学生办的“中国公学”，剪了辫子。他是同盟会会员，最早一批的国民党党员，曾经当过陕西靖国军秘书长，于右任是总司令。于右任离开后，他改作学术研究，研究先秦思想和古文字，著有《先秦思想论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曾经给杨虎城出主意，接触过共产党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他在1940年代发表不满国民党的文章。1948年他被共产党方面的王震接到共产党占领区陕北。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成为西北大学教授，并担任当时掌管西北地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党晴梵被任命为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这一职务级别很高，但是没有实际权力，同时党晴梵年事已高，基本上就待在家中。

文革开始后，1966年7月，陕西省政协秘书长和共产党统战部负责人频繁到他家中，

问他关于文革的看法等等，气氛相当严重。1966年8月初，党晴梵被通知去省政协开会。那里已经布置好“斗争会”会场。大会发言和大字报都早已经准备好。和他一起被“斗争”的还有茹欲理。茹欲理也是政协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过监察院院长。给党晴梵的罪名是“反党（共产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此后，党晴梵原来享受的可以坐小汽车等等待遇被取消。

党晴梵遭到“斗争”，是出于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在那一阶段，参与“斗争”党晴梵的省政协干部，虽然对他喝斥咒骂，还把大字报贴到他的家里，还没有动手殴打党晴梵也没有抄他家。当文革继续发展的时候，抄家打人以致打死人的行动是依靠年轻的红卫兵来实施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首次会见百万红卫兵后，迅速在北京和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抄家打人并且大量打死人的暴力活动。1966年8月30日，红卫兵到党晴梵家抄家。

在党晴梵家的抄家进行了多日。党家住在自己私有的一座单独的四合院里。当时党晴梵的妻子已经去世，他和他的幼子以及一个老保姆住在一起。他的长子一家住在同院，单过。党晴梵被关在一间房间里，和他的家人隔离开。不准他的家人和他见面或者谈话。他的家人听到他被红卫兵喝叱和殴打。

前往党晴梵家抄家的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当时这所中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多中共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在1966年8月，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象后来那样被“打倒”，而是仍然在该省的最高权力岗位上。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学校对老师和同学施用暴力，手段相当残酷。他们侮辱殴打折磨教师。教地理的女老师是回族人。他们给她剪了“阴阳头”，会把猪油和痰盂里的脏水混合起来强迫她喝下，他们强迫她站在架高的桌子上被“斗争”，然后推倒桌子使她摔下来。他们也残酷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有一个女同学，只因功课好又出身于教授家庭，被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打，从四楼一路摔到一楼。他们在校内外施暴。在党晴梵家的红卫兵，有的在党家住了下来。在党家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有几十个之多。

党家所有的东西都被仔细检索。9月3日，也就是党晴梵被打死的前一天，有几辆卡车开到党家，把他家的所有书籍字画以及家具衣物都拉走。党晴梵收藏有一些古书，其中较珍贵的有一套元代的雕版《南史》。他还收集有商代的青铜器拓片和甲骨文资料等等。除了书籍字画，党家的生活用品也都被拿走，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生活资料。还有干部模样的人来帮助红卫兵抄家。（文革结束后，在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个古书展览会上，展出了党晴梵的那一套元代雕版《南史》，展品说明说这部书的来源是“捐献”。）

9月4日中午，有三个红卫兵，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来到党家，进了党晴梵的房间。党家的人不敢阻拦，因为这只可能招致红卫兵更厉害的暴力行动。这三个红卫兵进了党晴梵的卧室。进去以后，过了不太长的时间，大约一二十分钟后，这三个人就出了房间，然后就匆匆离开了党家。

这三个红卫兵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是高二或者高三的学生。其中两个女红卫兵从一开始抄家就来到了党家，在抄家过程中相当活跃。

党晴梵的家人在红卫兵离开后立即进入他的房间。他们看到党晴梵在床上，满头是血，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床边墙上都有喷溅上去的血迹，血迹有一米多高。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楠木笔筒，笔筒上有血。他们估计党晴梵可能是被用这个笔筒砸死的。笔筒很硬也很重，用这个笔筒猛击头部的结果，可以把党晴梵打死，并且有血溅得很远。但是，到底党晴梵是怎么

被杀害的？笔筒是否唯一的凶器？这样的细节，只有在场者知道。党晴梵的家属当时不被允许在场。红卫兵离开之后，他们才进入党晴梵的房间。看到党晴梵身受重伤眼看要死，他们不敢呼救，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杀害党晴梵的红卫兵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又来了另一拨红卫兵，是和前一拨红卫兵一个学校的，他们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进门以后他们直奔党晴梵的房间。这些人进房间看了，看到党晴梵正在死去，就退了出来，没有作什么就离开了。这批红卫兵中有一个的名字是令狐静平，他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的西北电力管理局局长。令狐静平没有参与杀害党晴梵，他是这场杀戮的目击者之一。

党晴梵很快死亡。当天晚上，陕西省政协来了两个干部，对死亡现场作了检查和记录。这两个干部叫党晴梵的家人不要往外说此事。这两个干部的名字是郑殿辉，何岗。半夜的时候，火葬场的人来到党晴梵家，用车运走了党晴梵的尸体。这显然是陕西省政协的干部安排的。

党晴梵的尸体被火化后，骨灰没有留下。实际上，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或者在被毒打后自杀的人，不但被活活打死，而且连骨灰都不准留下。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被指为“阶级敌人”的死难者的下场。在文革后，为死难者平反的时候，却不把这种会议称为“平反会议”，而是一律称为“骨灰安放仪式”。这样的修辞方法明显含有尽量淡化文革迫害的意向，但是其实大多数受难者的骨灰都没有保存，在仪式上的骨灰盒子里，根本就没有骨灰。

党晴梵死后第二天，1966年9月5日，他的幼子和长子，以及长子的妻子和孩子，连加他的老保姆，全部被“遣返”，也就是强迫离开，扫地出门，押送往原籍农村。

这一“遣返”，也是1966年夏天红卫兵从事的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之一。这个说法“遣返”，是当年用过的原话。我们会注意到没有用“驱逐”而用了“遣返”这一较为客气的说法。实际上“遣返”并不是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词语。甚至“驱逐”也仍然和实际情况不合。当时发生的是用通过红卫兵的暴力性的抄家，以“打死人不偿命”的残酷手段，威胁和迫使“遣返对象”顺从地离开城市，到农村接受“专政”，很多人实际上很快就死在“遣返地”。另外，当地的公安局系统配合红卫兵行动，强行迁出户口。公安局的人并不出面打人，但是在红卫兵身后支持他们。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情况。这种特别性使得一方面造成失去法规的“无法无天”的恐怖，另一方面是恐怖的推行仍然相当有秩序而且有效率。

党晴梵被打死，他的家人只有顺从地离开，来到党晴梵的老家陕西省合阳县。在那里，他们身无立锥之地。党家的老保姆老家在别处，也被红卫兵押解走。就这样，在8月下旬到9月初的短短几天里。党晴梵由原来的“省政协副主席”，被抄家并打死，而且，党晴梵的家人也都被驱逐到农村。通过红卫兵和政府联合行动的之手，对一个家庭的巨大迫害完成得迅速而彻底。

在党晴梵被害之后，在西安，红卫兵在9月间成立了一个名叫“红色恐怖队”的组织。简称“红恐队”。这个组织的名字就体现了他们的行动性质。“红恐队”成员戴着他们的红色袖章，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成群结队，公然进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动。到党晴梵家抄家和杀害了他的一些红卫兵，成为“红色恐怖队”的成员。他们在“红色恐怖队”建立之前就开始了恐怖行动，有了这样的组织和名称，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明确和系统化。

由于西安的红卫兵的领导及骨干有很多是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之后，北京的文革领导人很快把文革的矛头对准各省的共产党的“当权派”，并且扶植起大批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随着身居高位的父母被“揪出来”，早期的红卫兵失势了。他们中有些人和“造反派”的冲突，使得中央文革抛弃甚至镇压他们。但是1

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否定。当“红恐队”和“造反派”发生冲突的时候，西安交通大学的造反派找过党晴梵的家人谈话，他们的目的是搜集所谓“保皇派”也就是保卫过前中共陕西省委的那一派的罪证，所以一度想用党晴梵之死作为对对方不利的材料宣传。但是接触以后，“造反派”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党晴梵当时头上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他们眼睛里，这样的人被打死，算不上他们要攻击的红卫兵的“罪”或“错”，因此不必调查和揭露。

1967年，党晴梵的儿子设法到了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上访接待站”“上访”。他试图改善一家人的处境，希望北京的领导人能对他父亲这样的情况有所怜恤。“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掌握领导文革的大权，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这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接待站有一些干部接见“上访”的群众。他得到的回答是：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对党晴梵的问题作“定性处理”。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从1972年开始，文革当局对之前受到严重迫害的老干部的政策有所缓解。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省政协给党晴梵作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随后，他的家人被允许回到了西安。党家的房子已经被占用。在他家原来的房子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屋。

后来，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恢复了工作。党晴梵在省里算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对他的死，统战部派几个干部作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时间太久，不可能弄清楚了；这是林彪路线的错。其时林彪已经死，并且从“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叛国投敌”的“反党集团”头目。

1976年，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1977年，中共陕西省委给党晴梵“平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实际上是把一个空骨灰盒子放了一下，因为党晴梵的骨灰根本没有被保存下来。党家人再次要求调查党晴梵之死。中共陕西省委把案子交给了陕西省公安厅。但是仍然不了了之——没有结果就是这件事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文革后当局的政策是，对文革中的死难者，给予“平反”，但是对害死他们的人，却没有追究也没有惩罚。

1980年代，中共北京市委曾经派两个干部找党晴梵家人调查。原因是陕西省政协“审干处”写信给中共北京市委，说当时已经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的干部王申，在文革中杀害了党晴梵。王申在1966年时是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红卫兵以及“红色恐怖队”的骨干，他的父亲是当时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调查的目的是要决定该干部是否得到提拔重用，而不是要对其作法律方面的惩罚。党家人不知道后来王申是否在晋升方面为此受到影响。

党晴梵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81岁的高龄。这样一个高龄老人被活活打死，分外残酷。同时，应该指出，他并不是象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因为年迈体弱，所以受到一般性的殴打就死亡了，也不是因为他有心脏病那样的突发性疾病，在受到殴打折磨后，疾病突然发作以致引起死亡。党晴梵被殴打折磨数日后，又被红卫兵以重物猛击头部，头部大量流血，血喷溅到他床边的墙上。他被重物猛击后很快就断气死亡。另外，党晴梵也不是如有些人可能想象的那样，在人多手杂或者群情失控的混乱情况下，被打过头或者被失手打死的。他的被害，是一种谋杀。

党晴梵的被害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这是当时在陕西和全国发生的大量杀戮的一例。在西安，本网页通过调查了解到的就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被毒打侮辱后自杀。读者可以键击“死亡发生地”和“西安”发现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在西安的受难者中，有一名是袁玄昭老师，西安第五中学的教师。他曾是党晴梵的学生，死于党晴梵之后。

党晴梵的死，是红卫兵的行动结果。红卫兵的广泛建立以及在校内校外大规模施用暴力，是在北京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局直接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各省，中共省委也积极组织和支助当地的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除了大方向方面的理论指导和行政方面的措施安排，在北京和各省的权力当局还介入了局部的细节性的迫害行动。这场大规模的迫害，不但伤害以致杀害了大量的普通人，也杀害了党晴梵这样的有很高地位但是当时被文革当局设立为打击靶子的人。在党晴梵的案例里，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权力当局和“群众组织”紧密配合进行迫害和杀戮的情况。这样一种犯罪方式，是文革犯罪的特点之一。

西安是中国最古的城市之一，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在两千两百多年以前，汉王刘邦在那里建立了汉王朝，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汉族”“汉人”“汉字”“汉语”的来源。刘邦率领军队进入关中地区的时候，和当地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盗，抵罪。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不能杀人，不能伤人，不能偷盗，就是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律令。但是，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文革把这最基本和重要的律令打破了。红卫兵公然打死了一个八旬老人党晴梵，却从来没有被当作是一种犯罪。

30多年过去了。党晴梵的家人一直想要和当时殴打和杀害了党晴梵的红卫兵谈话。他们想要知道事情的经过，也希望听到作恶者的忏悔和道歉。他们还要等多久？

◇ 陈葆昆

陈葆昆，男，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1966年8月17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

北京101中学建立在圆明园的故址上，离北京大学很近。文革以前，校园里建有一个喷水池，池里有一个白色的仙鹤雕塑，水从仙鹤的头顶喷出，落在下面圆形的水池里。陈葆昆就在这个喷水池边被打死。

1966年8月17日在101中学被毒打的，除了陈葆昆以外，还有十多名该校的教师和副校长、教导主任等人，即当时在“专政队”里的所谓“牛鬼蛇神”。红卫兵强迫他们在校园小路上爬行。路面是用煤渣铺的，当时正值炎夏，人们穿单裤或者短裤，在煤渣路上爬行一段以后，他们的手和膝盖都鲜血淋淋。他们一边爬行，一边被打。有红卫兵学生在他们身后，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们的头和后背。

一名当时的学生说，她看到，在爬行过程中，有一个红卫兵学生，脚穿厚重的军用皮鞋，走过去一脚踩住了一位女老师的手，然后转动他的脚，使劲在那只手上碾了几圈。

这些被打的人中的女老师，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即剃去半边头发，头皮一半白，一半黑，当时称为“阴阳头”。（中国古代的“阴阳”图案，是由黑白两个部分组成。这个图案也在现在韩国的国旗上。但是红卫兵未必由看到这个图案而命名这种人身侮辱的做法。“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但是古代的哲学家不可能想象到这个词汇被这样使用。）

在喷水池前，这一群“牛鬼蛇神”遭到残酷殴打。那时候，喷水池中的白色仙鹤雕塑已经被砸毁，池子里还有水。很多红卫兵围着打。有一个学生拿来火柴，点燃了陈葆昆的头发。

陈葆昆被打得昏迷过去以后，打人的红卫兵学生把他的身体脸朝下扔进喷水池中。陈葆昆死在喷水池里。喷水池的水很浅，很可能陈葆昆在被扔进水池以前，已经被打死，所以不能在水里挣扎出来。

后来红卫兵学生把陈葆昆的尸体从水池里拖上来，丢在教务处后面的一间小屋里。他们向其他在“专政队”里的老师说：“这就是阶级敌人的下场。”他们命令其他“牛鬼蛇神”打陈葆昆尸体的嘴巴。如果不打，他们说，就是“和反革命划不清界限”。

陈葆昆在8月17日被打死。第二天，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接见和检阅红卫兵。101中学的红卫兵都赶进城去参加接见。陈葆昆的尸体丢在学校中无人处置。8月18日大会之后，火葬场来车子把陈葆昆的尸体运走了。

8月18日大会后，校园暴力继续发展升级。101中学一共有一百多名教职工，先后被关进“专政队”的有60多人。到了1966年秋天，还把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人张文松等也抓到学校里“劳改”。

101中学在1950年代建立时是一座只供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使用的寄宿学校，文革前已经改成和普通中学一样，但是干部子弟的比例仍然大大高于一般中学，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1966年夏天，干部子弟在红卫兵运动和暴力行动中是主导力量。101中学的红卫兵以暴力性和破坏性强在北京出名。

除了殴打折磨教员和学校领导人，101中学的红卫兵还攻击住在学校教工宿舍中的家属，有两名老人被殴打后自杀，其中一名死亡，一名残废。

101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到教职员家抄家，烧书，砸所谓“四旧”即一些艺术品和文物，还向教职员要钱要粮票，即使这些教职员还没有被“揪”进“专政队”中。不堪骚扰，有的教职员只好每天清晨就起床，躲到学校附近的高粱玉米地里，直到深夜才敢回家。

101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把学校大门隔成两个，小的一个写明是“狗洞”，命令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教职员和学生出入学校必须走“狗洞”。他们也在学校殴打和“斗争”了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别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

101中学建立于圆明园的废墟上，校园很大，有大面积的苹果园。就在打死陈葆昆的时期，果园里的青果子被该校学生抢劫一空。有的被吃掉，有的太生不能吃，就被扔掉。

1979年10月，文革刚刚过去不久的时候，笔者曾经骑自行车到101中学校中，观察那个曾经作为1966年暴力现场的喷水池。那里没有一滴水，也没有白色的仙鹤，只见灰扑扑的水泥栏杆和肮脏的池底，旁边仍是煤渣铺的小路。从1966年后的13年后，文革留下的就是那么一幅贫穷、衰败、麻木的景象。

1995年夏天，笔者又到101中学调查采访。我注意到普通教师的家里的厨房新铺设了白色的瓷砖，干净美观。我也注意到，喷水池重建了，池里设置了一群白色的仙鹤，展翅欲飞的样子。

101中学的喷水池的历史，也是和文革以及文革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谈到这个学校的正在写作中的校史的时候，一位在101中学经历了文革的老师说，“对文革这一段不会很详细”。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很无奈。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网之后，一位文革时代是北京101中学学生的历史研究者看了网页，发表评论说：陈葆昆是有问题的人，网页上怎么能不介绍这一点？对此，笔者的回

答是：陈葆昆被红卫兵学生打死这个事件中，陈的“问题”不是相干的因素。因此，虽然笔者在调查中了解陈葆昆的“问题”，在网页上却没有特别说明。

这个案例，牵涉到什么是“受难者”，也牵涉到对文革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评判问题，所以需要严肃的讨论。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陈葆昆在一个北京的一个工厂劳动，并不在学校教书。他在文革前被判刑三年，监外执行。被判刑的原因是他对男学生有不当性行为。他的家人仍然住在101中学校内的教工宿舍里。

非常清楚，首先，陈葆昆的“问题”是三年监外执行的徒刑。他在文革前被判罪的时候，并没有人发动学生打他。尽管他有罪，但是法庭已经作了惩罚。打他是非法的。

其次，101中学的红卫兵把他打死，则是一个杀人案。至于打死陈葆昆的红卫兵学生犯的是什么性质的杀人罪，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以及通过审判来决定。但是，实际上文革的大量杀人案不但没有得到调查，甚至从来没有被报告。

第三，101中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17日的暴力行为，并不是只针对陈葆昆一个人，是针对作为一个群组的教育工作者的。毒打陈葆昆以及该校其他教职工的行为，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事件。文革是造成这一杀人案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红卫兵校园暴力的受难者中，陈葆昆可能要算是最极端的案例之一。他被判过三年监外执行的罪。至于其他受难者，虽然都攻击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作者未发现任何一个人当时是在刑事处分期间的。

一定要说清楚的是：对陈葆昆，他的所谓“问题”，不能成为把文革迫害和杀戮合理化的根据；也绝不能把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解释为是“打坏人”或者“打坏人过了火”。

□ 原载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

# 【当事者说】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兼答季羨林

• 聂元梓 •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情况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换个例子说，陆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对陆平的孩子搞过什么鬼名堂？没有啊。陆平是陆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邓朴方我也没有讲过要整他。当年那种条件下，我在校文革负责，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都会记在我的账上。给邓朴方治疗的事，我没有插手，当时那种思潮影响下医生护士对他的态度，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换了一种情况，也许会治疗好一些，但是，这都不是我搞的。

#### ◇ 兼答季羨林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羨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羨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羨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羨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羨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羨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羨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羨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羨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羨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羨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羨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羨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报复。季羨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

【各抒己见】

文化大革命论

• 解 龙 •

一，文化大革命的日历

现在，谈论“文革”的人很多，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自以为满身创伤的受害者，怀着“共产党走资派特有的还乡团式的义愤”，从事着“事后聪明的谴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泽东的死亡及其宫廷的分裂（一部分毛的党羽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枪杀了毛的侄子毛远新，并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并把这场宫廷政变叫“粉碎四人帮”）。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是极不严肃的政治流氓行为。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1969年。它的特征，就是被毛泽东煽动（甚至得到鼓励）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人民，又被毛泽东背信弃义地镇压下去（甚至淹没在血泊之中），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广大学生，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受到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上山下乡”。被人民革命（造党委的反）冲毁了的党的机器，再次建立起来，严厉清算参加造反的人民，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清理阶级队伍”。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去年（指1979年——编者）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先是利用魏京生等人起来打民意牌，后来翻脸不认人的行径，如出一辙；有识之士盖称之曰：“过河拆桥”。“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蹄，占领学校的阴影，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送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区别于共产党寡头的文化大革命）的死刑判决书。

“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文革的“无产阶级理想”开的一场追悼会！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 一，打倒特权阶级、消除官僚压迫；
- 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完成之后，实现上层建筑的革命，消灭政治上的人压迫人制度。
-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的社会。

这样的理想是否非可以操作，是一回事；但毕竟它赋予文革以极其巨大的动力。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1966年秋天分批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时，他们不是来向共产党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1957年右派的复辙！难怪当时的官僚攻击学生的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于右派的向党进攻”。至于，在1966年8月—12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刘少奇！”）之前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即迫害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等前反动势力的活动，本来就是由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带头干下的虐待狂行为，和后来的“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向党进攻“），性质完全不同。

当学生们在1967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地卖弄风情时，他们唱起了”抬头

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淫辞秽曲，这时，他们的冲动，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毛和党的个人迷信“，而是试图寻求自己心目中的反压迫英雄。

而从1969年到1976年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间的一本血泪帐，充满了宫廷的阴谋（”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党棍的倾轧（毛的左右手——坐在他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他右边的周恩来、邓小平——们的钩心斗角）。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的意义，又无革命的价值，怎么能插入“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呢？这些蝇营狗苟，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动物性闹剧”罢了。它可能拥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共产党世界里第一次出现的神经瘫痪征。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国、从此将与共产秩序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思想解放”。可惜，今天的人们对此并无清晰的认识。

按照我们的观念，“文化大革命”只包括两年的时间：1966年8月—1968年8月。1969年9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驱逐干净，这时，再说这场革命“还在继续深入”：要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别有用心，要么就是说者糊涂，“中了共军的奸计了”。而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于“造党委的反”的无畏精神，结束于“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1966年8月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结束。

1967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流血冲突。

1968年，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共产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施行“釜底抽薪”来扑灭可能触发的人民革命。

1969年“九大”以后，党内群僚暂时联合，下压人民革命，外骂“苏修”以转移视线。

比较一下：1966年8月—1968年8月的“向党进攻”和1969年—1976年间的这两个时代，就知道，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向上、紧张亢奋的；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共产党官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这是两个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的时代：革命与反革命。应该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68年；“文化反革命”开始于1969年，结束于1976年。

四人帮的垮台，早在1968年他们伙同周恩来等人一起镇压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何需“擦亮眼睛”，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际。

二，文化大革命的动力与象征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同党。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党，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

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同党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的人民的愤怒，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它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力——人民的普遍情绪——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同党“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要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因为如此的创造，实出于人类的能力以外，否则，毛泽东后来还可以继续挑动群众互殴，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可是同时，对这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毛本人又具有不可推卸的领袖责任。所以，他和人民革命之间的蜜月，难以持久。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人民的不满没有得到宣泄，社会问题无从解决；同时，由于它”冲击“的人过多，反而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尽管让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的许诺却又无法兑现，”破而不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立情绪，逐渐集约化，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天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这时早已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具有深入一层的勇气 and 智力，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求知，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统治的敌视，外部世界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世界压力的表现。

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毛泽东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独立注定不属于他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里的萤火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只有如此，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天命，重新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是出于国王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所以，1969—1976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他。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太不纯粹；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掉的垃圾、渣滓”的意义上，才可能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他们的受害也不是出于殉难（主动的进取和牺牲），而是由于迫不得已的告免无效。因此，这种苦难无法开出新一轮的生命之花。而能不能开出新的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中性的傀儡，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一种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

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是荒漠。是废墟。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象一座巨大的粉碎机。它把中国大陆上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精神”），都包举到自身以内，粉碎之一一迫使他们“低于毛”。那时，是没有一处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人“遗世独立”，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

无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

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它坚韧不拔。它百折不挠。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度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

三，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预后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暴发户”（按当时术语，叫做“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这里的“国王”、“贵族”，只是一种隐喻。他们都因为“理论（为人民服务）脱离实际（作官当老爷）”的致命点，而只能是一些没有名分、昙花一现的暴发户。

文化大革命，也和历史上各种“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我运动的“三部曲”：

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
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
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现在邓小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

一，如果人民没有受到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后来被重新修好的伪国王、伪贵族，打成“反动口号，很能说明它的人民性），他们便不会怨恨贵族；
二，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
三，国王与贵族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镇压人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贵族们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他们的苏联老大哥那里都是没有先例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自我意识，不在于它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使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还只在“言”的层次、没有在“行”的层次完成。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

从此，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精神上的梦魇，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渣余孽，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冰洋瓦解、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实指而不是象征。它向前一个世纪的传统和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正因为这样，自1969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1969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一，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50—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无孔不入地令人作呕，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意外解放，是多么歪打正着的珍贵。

二，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只是骗术的集大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扒掉了一种血腥宗教的伪善面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宗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

园；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无知少女般的纯真！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1949—1966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49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毕竟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的骷髅！

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所谓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宪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一，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专制政体；
二，汉文帝或李世民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这启发我们，是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候了！或是，老哲学的变相复活。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于新的国际背景的新形态国家：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空前苦难的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高耸的山峰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

前面，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一面，也说它消极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毕竟过去十二年（1968—1980年）了。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超越文革、消解文革了。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中国一百年来的“野蛮化趋势”，它把毛泽东的神话推向了顶峰又弃入了谷底。毛泽东的神话扮演了粉碎机的角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

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

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这种反应，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

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借用极左方法以铲除左派势力的最后的革命”！

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革命的革命，叫做“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练，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静。

在自新运动的后半期，野蛮化的倾向将逐渐转移、凝练为全新的指向：

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

这新的指向，很可能采取某种人格化的形式：通过一位“体现了历史节奏的人”来实现。他——坚定而灵巧；无情而感人；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

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真诚的人！

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征，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全部社会基础（反民族基础）的民族革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

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将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则，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小小的半成品。

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他不会被碾为齑粉的。

是中国历史的强大支持力，迫使他起而应战。

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抗力，簇拥他无畏无惧。

他清醒地知道：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没有到升起时刻——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在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

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这些赘物的以示区别，恰恰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的改朝换代，都带来巨大的民族灾难。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为民族整体的存在力……
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
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 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1980年11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